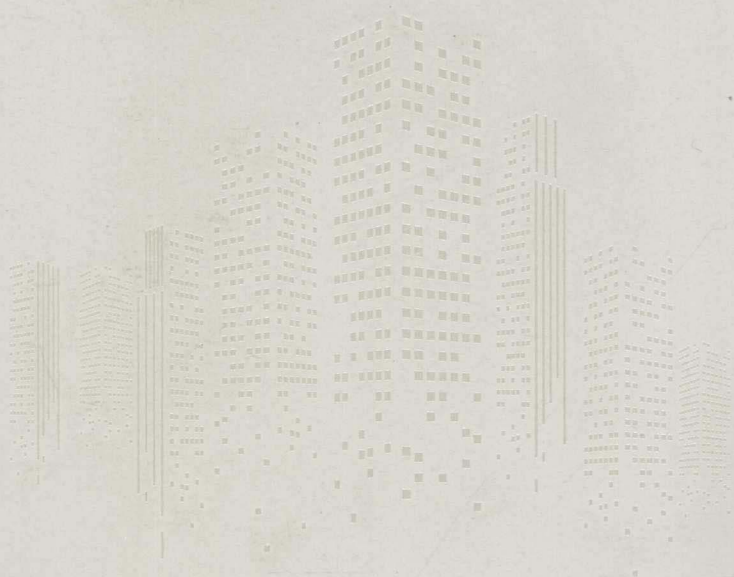




TEJU COLE

OPEN CITY

不設防的

城市

泰居·柯爾——小說
楊馨慧——譯文

OPEN CITY

TEJU COLE

不設防的城市

作者 泰居·柯爾
譯者 楊馨慧

總編輯 汪若蘭
責任編輯 徐立妍
行銷企劃 高芸珮
裝幀設計 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發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南昌路2段81號6樓
電話 02.2392.6899
傳真 02.2392.6658
郵撥 0189456-1

著作權顧問 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 董安丹律師

初版一刷 2013年7月1日
定價 新臺幣300元整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號第1295號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32-7231-1

OPEN CITY
Copyright © Teju Cole,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不設防的城市
泰居·柯爾(Teju Cole)著；
楊馨慧譯
初版。--臺北市：遠流，
2013.07
面：公分
譯自：OPEN CITY
ISBN 978-957-32-7231-1(平裝)

87.45"
102011690

不設防
的

城市

秦居·柯爾 —— 小說
楊聲慧 —— 譯文

PART I

DEATH IS A PERFECTION OF THE THE EYE
死亡看似如此完美

CHAPTER

ONE

就這樣，去年秋天起，我開始在晚上出門散步，我發現很適合以晨邊高地做為起點，跨步進入這個城市。從聖約翰大教堂穿過晨邊公園，往下走到中央公園只要十五分鐘。如果從另一個方向往西走，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到達櫻花公園，再往北走就可以沿著哈德遜河走到哈林區。只是一路上車輛嘈雜，完全無法聽見行道樹後方河流的聲音。這樣的散步和醫院繁忙的工作形成了強烈對比；漫遊在這城市，循序漸進、一次又一次走到更遠的地方，結果我常常在深夜裡發現自己離家太遠，而不得不搭乘地鐵回去。就這樣，在我待在精神科實習的最後一年之初，紐約市就以這樣的步調，走進了我的生命。

其實就在我開始漫無目的散步之前不久，我才喜歡上從我的公寓觀察鳥兒遷徙，我不知道散步和這件事有沒有什麼關聯。那些日子裡，要是我從醫院下班得夠早，我總會像以鳥卦占卜的人似地望向窗外，期望能夠一睹大自然生物遷徙的奇蹟。每每看見雁群劃過天際成隊俯衝，我總是很想知道，我們在地面的生活，從牠們眼裡來看是什麼樣子？我也曾懷疑過，牠們會不會也放縱想像，把一幢幢的高樓看成是叢聚的杉木？常常我望向天空，看到的只是紐約的雨，又或者是在噴射客機留下的雲痕，硬是把我的窗子一分為二。某些時候，我甚至開始懷疑這些鳥兒的存在，我不知道這些鳥兒，牠們的深色翅膀和頸子、灰白的身體，以及小小不倦的心臟，是否真真實實存在過。我很訝異，如果沒見到這些鳥兒，我竟然連自己的記憶都無法信任。

鴿子時不時會打我窗前飛過，那些滑過天空的鳥兒，像是極微小並且色彩不鮮明的小點點，雖然幾乎讓人無法辨別，但我還是勉強認出了麻雀、鷓鴣、黃鸝、風琴鳥，和褐雨燕等等，牠

們經常出現。我常常守在窗邊，等待著極少來訪的野雁中隊，有時候我會扭開收音機讓房子裡有點聲音。我不太收聽美國的電台，因為節目中夾雜太多廣告，聽完了貝多芬，馬上有人推銷滑雪夾克；華格納一結束，立刻接著阿蒂仙諾手工起司。我比較喜歡收聽加拿大、德國，或是荷蘭的國際電台，雖然我常常聽不懂主持人在講什麼，畢竟那些大都是我不熟悉的語言，但是有一點關係也沒有，因為這些節目的內容往往完全符合我晚上的心情。怎麼說我也算是古典音樂台的忠實聽眾，聽了超過十四年，所以多數音樂都是我耳熟能詳的，不過偶爾還是會聽到一些新曲子，然後在極少數的情況下，也會有一些驚喜，有一次我就透過德國漢堡的某家電台，意外聽到了令人醉心的管絃樂曲搭上聲樂獨唱，應該是俄國作曲家謝德林的作品吧，還是比利時的伊薩伊呢？其實我到今天都還是搞不太清楚。

我喜歡把音量轉低，聽著電腦喇叭從千里之外，小小聲地傳來主持人的聲音，我望向窗外，享受這些聲音帶來的寧靜感；想著歐洲某處的半夜裡，獨自在錄音間裡工作的主持人，對比著那一刻空蕩蕩的公寓裡的我。這些脫離現實的聲音仍舊停留在我的腦海裡，即使是現在這一刻的我，看見遷徙中的野雁而又驚又喜，樂音依然繚繞。其實我真正看到牠們遷徙，總共也只有三、四次，多數的日子裡，我只見到傍晚時分天空中的光影變化，從淡淡的灰藍轉成不明亮的赭紅，然後是土黃色，最後漸漸揉暗藍於夜晚，以一片深影籠罩大地。天色擦黑之際，我會倚著一盞從學校垃圾車中搶救回來的舊桌燈閱讀，燈罩像是一朵風鈴草，輕輕裹著燈泡，微微透出一絲溫潤的綠光，撒落在我的雙手、大腿上的書，以及沙發的破舊襯布。有時候，我甚至故

意大聲念出書頁上的文字，注意到我的聲音如何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和這些法國的、德國的、或是荷蘭的語言交雜在一起，又或者是和樂團裡微弱的小提琴弦音和鳴，種種形式都是在告訴我，不管我讀的是什麼，彷彿都是從某個歐洲語言翻譯過來的。那個秋天，我飛快地翻過一本又一本的書，像是羅蘭·巴特的《明室》、彼得·愛頓伯格的《心靈電報》，和達哈·班·哲倫的《最後的朋友》，還有很多其他的書。

這樣重疊的聲音好像樂曲中的賦格，讓我想起了聖奧古斯丁。我想起他第一次去拜訪米蘭大主教聖安伯羅斯：他看見主教竟然可以沒有發出聲音而暗自默讀，讓他驚訝不已。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我到今時今日還是像當年的奧古斯丁一樣感到詫異——我們居然可以不用念出文字，光是藉由默讀就能理解語意。對奧古斯丁來說，想要體驗每句話的重量和靈魂，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念出聲音。顯然這個想法並沒有傳承下來，在現今的社會裡，要是一個男人自言自語，別人會認為他要不要有什麼怪癖，要不就是瘋了。除了和別人對話，或是趁一群人喊叫時自言自語，我們不再習慣自己的聲音。但我曾經看過一本書中提到：會話應該是一個人跟另一個人說話，語言的聲音交換是，也應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所以我念書給自己聽，賦予別人的文字我的聲音。不管怎樣，這種獨特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我老是在沙發上沉沉睡去，一直到了一半夜裡才醒來，然後拖著自己的身體回到床上，感覺睡不到幾分鐘，就又被手機的鬧鈴吵醒，那是馬林巴木琴彈奏版的〈噢！聖誕樹〉。每天早上醒過來的前幾秒，在清晨的微光裡，我總奮力恢復思緒，試圖抓住夢的片段記憶，或者是回想自己前一天睡著之前讀了什麼東西。

每一週有兩、三個晚上，我選擇這樣度過，才不會重複過著無聊又枯燥，千篇一律的下班生活，而週末至少有一天，我會出去散步。

起初，街道上的嘈雜聲響持續在我耳邊放大，在我結束一整天專注而安靜的工作以後，這些聲音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就像在一處寧靜的小教堂裡，突然有人打開電視機，傳出了高分貝的刺耳聲。我走過逛街的人群和工人，穿梭在道路工程和計程車的喇叭聲中，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比起我在醫院工作一天，行經鬧市讓我多遇見了百來個人，又或者上千個吧，但是這些不計其數的面孔並無法消弭我的孤獨感，要有的話，也只是讓我更顯孤單罷了。所以只要一開始散步，我就變得更加疲憊，精疲力竭的程度，就像三年前我剛剛開始做實習醫生的頭幾個月那樣。有一晚，我沿著休士頓街持續不停地走，走了大概有七哩遠，好像散盡所有的氣力，累到連方向都無法判別了，甚至連繼續挪動腳步都很費力，後來只好搭地鐵回去。我原以為回到家、躺上床後就能立刻睡著，沒想到卻因為過度疲倦而無法放鬆，遲遲不能入眠。我躺在黑暗裡，拼湊著散步時見到的所有景物，試圖把一切的一切分類，就好像小孩玩積木一樣，努力想拼出哪一個應該擺在哪邊，或是哪一塊應該接上哪一塊。這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好像都有不同的組成物質，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氣壓，為每個人的心靈帶來不同的感受。某幾條路上的街燈很亮、有些商店掛了百葉窗、某些地方可以看到新建案、可能有豪華旅館、走到這裡有外牆逃生梯、或是停在那裡可以看到公園。我一直這樣沒什麼意義地分類著，直到這些景物開始相互融在一塊兒，成了抽象的形體，彷彿都跟這座真實的城市毫無關係，我不停運轉的腦袋才總算

饒了自己，我也才可以安然入睡、不再做夢連連。

散步於是成了一種必須，讓我因為繁忙工作而緊繃的精神狀態得到釋放，就在我把散步視為自我療癒的那一刻起，散步就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我甚至連過去沒散步的日子是如何生活的都想不起來了。我的工作嚴格要求能力適任，凡事都得盡善盡美，不能允許任何臨場的即興發揮和極小的錯誤。我手邊正在進行一項很有趣的計劃，是關於老年人情緒失調的臨床研究，比我過去所做過的任何一項研究都要來得複雜。散步於是成了我迫切需要的平衡。穿梭在街衢間，每個決定都沒有一定的道理：要在哪裡左轉？要站在廢棄大樓前發呆多久？要不要從紐澤西觀看日落？或是要大步邁進東區，遠眺對岸的皇后區？只有這種種選擇提醒著自己：我還擁有自由。彷彿要以我的步幅測距，我大步地跨過城市裡一個又一個街區，地鐵的存在讓我肆無忌憚隨意而走。每每看見大批大批的人潮湧入地下建築，我總是無法理解，有種很詭異的感覺，彷彿所有的人全都匆匆忙忙、違反本能地投入死亡狂潮，擠進移動的地下陵寢。若是走在地面上，我和其他數千個人互不相干、各擁孤絕；但在地鐵裡，緊靠著陌生人站立，為了多一點空間、多一些空氣，推擠人同時也被推擠，每個人各自重演著內心最深處的創傷，那種孤獨感又更加強烈。

十一月的某個星期天早晨，我剛散步走過上西城安靜的街道，來到哥倫布圓環，廣場很大，當天陽光充沛。這個地方變了好多，拜時代華納公司新建的雙子星大樓所賜，圓環變得很商業，成了觀光客的朝聖地。兩棟大樓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工，最近剛剛開幕，走進去可以發現訂做西服、設計師套裝、高級珠寶、頂級廚具、手工皮件，還有進口家飾品。高一點的樓層開設的都是全城最昂貴的高級餐廳，標榜著頂級食材，像是松露、魚子醬、和牛，以及其他貴到嚇人的「私房特製品評菜單」。餐廳樓上還有頂級公寓，能住得起的，肯定也是整座城市裡最有錢的那些人。我曾經因為好奇而走進商場一、兩次，但驚人的產品價格，以及在我看來叫做浮華的氛圍，讓我從此止步不前，一直到了那個星期天早晨。

那一天恰好是紐約馬拉松比賽日，但事前我並不知道。看到大樓玻璃帷幕前的圓形廣場上擠滿了人，我著實嚇了一跳，觀賽人群已經擠滿了馬拉松終點周邊。從廣場往東的方向，連綿不絕的人潮排滿了街道。廣場西邊不遠的地方架了露天音樂臺，兩個男人抱著電吉他在臺上調音，相互發出錚錚的撥弦聲。布條、牌子、海報、旗幟，還有各式各樣的彩帶揮舞在風中。警察騎在馬背上管理秩序，馬兒全都戴上了眼罩，員警拉上封鎖線，吹著哨子，忙著以手勢指引群眾，他們的制服是深藍色的，每個人都戴了遮陽帽。參加活動的人群用最鮮豔的色彩裝飾自己，在大大太陽底下看著這些綠的、紅的、黃的、白的色彩，我的眼睛都覺得痛了。為了閃避看似愈演愈烈的喧囂，我決定要躲進購物中心。我記得在中心二樓，除了亞曼尼和 Hugo Boss 等精品店以外，還有一間書局，我原以為自己可以躲在那裡享受一杯咖啡，等到嘈雜聲浪平息以後

再起身回家，卻沒想到商場入口擠滿了像是從街上滿溢出來的群眾，而且前面的路被警察封住，我根本也進不去購物中心。

於是我改變了主意，決定到附近拜訪以前的老師齋藤教授，他的公寓距離中央公園南路不到十分鐘的路程。齋藤教授已經高齡八十九了，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高壽的。我還在麥斯威爾大學念大三的時候，教授對我照顧有加，當時他已經是榮退教授了，但還是每天到校園來。想必他是從我身上看到了什麼，讓他以為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早期英國文學知識灌輸給我。單就這一點來說，我應該是讓他失望了，我的「莎士比亞前英國文學」討論課成績並不理想。儘管如此，他還是非常仁慈，邀請我到他辦公室聊了好幾次。那一陣子，他才剛裝了一台聲音大到足以惹惱人的咖啡機，於是，我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聊著《貝武夫》的翻譯，或是到了後來，聊古典文學、聊學術生涯無止境的努力跟成就、也聊他在二次大戰前的研究。顯然這當中的最後一項，因為離我最遙遠，所以最吸引我。戰爭就在他拿到博士學位後爆發，於是他被迫離開英國，返回位在美國西北的家鄉，但是過沒多久，他和家人就都被關進愛達荷州的米尼多卡集中營^①。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那些日子幾乎都是教授在說話，因為這樣，我才學會聆聽的藝術，從遺漏的細節裡搜尋任何蛛絲馬跡。齋藤教授幾乎不提他的家人，但會聊他做為學者的這一生，或是他如何看待那個時代的一些重要議題。他在一九七〇年代翻譯了中世紀英文敘事詩《皮爾斯農夫》，並附加文獻註解，這是他廣為人知的學術成就。談到這本書的時候，他的臉上混雜

著一種既驕傲又失望的神情，他意有所指地提及另一項永遠無法完成的大計畫，但他沒有明說是什麼。他也跟我談學術圈的政治。我記得某個下午他聊到從前的一個同事，因為名字不重要，所以我沒有記住。在人權高漲的時代，這位女士因為相當激進而聲名大噪，一度成為校園名人，她的每一堂文學課永遠座位不夠。在齋藤教授眼裡，她是個敏感又聰明的人，只是他們就是不合。他欣賞她，但不喜歡她。有點複雜，我記得齋藤教授說：「她是個很優秀的學者，在那樣動亂紛擾的時代裡，她的立場方向也很正確。我只是無法苟同她的為人，她那個人的個性既強烈又自負。噢，願她的靈魂在天國得安息，我們在這裡可不能說她的一點不是，大家可是依然視她為聖人的。」

後來我們變成像是朋友之後，我決定每學期去找教授兩到三次，而那些時光成了我在麥斯威爾最後兩年裡，最珍貴的精采回憶。對我來說，他就像是祖父那樣的長輩，只不過和我自己的祖父完全不一樣（其實我也只見過一位祖父）。我覺得比起那些「恰好跟我有關係」的人，齋藤教授和我的共同點還比較多。畢業以後，我先到冷泉港做了短期研究，後來又去麥迪遜念醫學院，我們就失去連絡了。我們曾經有過一、兩次信件往返，但是在信裡總談不了太多，畢竟我和他之間的交流並不僅僅是近況更新啊。不過在我回到這個城市實習之後，我見過他好幾次。第一次完全是意外，但卻是發生在我想到他的某一天，就在離中央公園南路不遠的一家雜貨店外，他在旁人的攙扶下出來散步。之後我便常常不期造訪，就像當年他歡迎我的方式一樣。齋藤教授到現在還是保持著當年在校園裡的習慣，他的辦公室永遠「門戶大開」。當年辦公室

裡的咖啡機如今也退了役，靜靜躺在房間角落。齋藤教授告訴我他得了攝護腺癌，雖然不是真的那麼衰弱，但他已經不再到校園裡了，只在家裡「接見」他的「仰慕者」。他的社交活動大幅縮減，那一定讓他很難受；他的訪客慢慢減少，到最後幾乎只剩下護士或是家庭看護了。

門廳的天花板很低、光線昏暗，我和門房先生打過招呼以後就搭乘電梯上到三樓。才一進屋，齋藤教授就喊出我的名字。他在公寓的另外一頭，靠著大窗戶坐著，他示意要我過去他面前的椅子坐下。老先生的視力有些退化，但聽力仍像當年我初認識他時一般靈敏。那時候他七十七歲，而如今卻裹著毯子窩在沙發裡，好像進入第二次嬰兒期似的。不過倒也不是那樣，他的腦子就和他的聽力一樣依然敏銳；笑起來的時候，皺紋爬滿他的臉，薄如紙片的皮膚在前額皺起。房子裡似乎流淌著來自北方溫涼的光，齋藤教授住在裡頭，身邊環繞著他畢生收藏的藝術品。他後方的牆上陳列著六張來自玻里尼西亞的面具，位置看來恰好好像是教授頭上的深色光環，牆角站了一尊真人大小的古代巴布亞人偶，木偶的牙齒一顆顆雕刻得很清楚，身上的草裙幾乎遮蓋不住直挺挺的陽具。關於這尊木頭雕像，齋藤教授有一次告訴我：「我崇拜想像中的猛獸，卻懼怕現實生活中的那些。」

公寓的外側有一整排窗戶，對面就是公園，公園外圍著一道舊石牆。我才剛坐下就聽見街上傳來的吼叫聲，我馬上站起來往外看，那是一名男子獨自跑過馬拉松群眾拉出的一條路線。他穿了一件金色襯衫，不知道為什麼戴著一副長及手肘的黑色手套，好像女士參加晚宴所用的正式配件，他好像得到鼓舞、獲得了新的動力一樣，開始衝刺，他往前衝，能量回到了他的身上，

他衝向露天音樂臺、衝向熱烈的群眾、衝向終點線，也同時衝向太陽。

「過來啊！坐啊！坐！」齋藤教授一邊咳嗽，一邊用手比著椅子。「最近都在做些什麼呢？你看看，我又生病了；上禮拜比較嚴重，不過現在好多了，我這把年紀的人很容易就會生病。你呢？你好不好？」窗外再度傳來嘈雜聲，然後又消下去。亞軍也衝過樓下了，是兩名黑人。肯亞人吧，我猜。「每一年都差不多是這樣，應該是第十五屆了吧。」齋藤教授說，「以前我要是想在馬拉松賽跑日出門，就必須從大樓後門走；不過我現在已經不太出門了，我總不能背著這個，像是帶條狗尾巴似地出門吧。」就在我坐下的時候，教授用手指著掛在金屬桿子上的透明袋子，裡頭已經裝了半袋尿液，連著一根塑膠管鑽進毯子底下。「昨天有人幫我帶了些柿子，結實又好吃，你要不要來一些？真的，你應該嘗嘗的。瑪莉！」教授的看護是位來自聖露西亞的中年女性，她很高，體格也很結實，我之前來的時候已經見過她幾次。聽到教授喊她，瑪莉走了出來。「瑪莉，可以麻煩妳幫我們的客人準備一些柿子嗎？」她走進廚房以後，教授告訴我：「我的牙齒已經有些咬不動了，所以像這種又營養又好買的柿子最適合我了。不過不說這些了。你都好嗎？工作如何呢？」

我的到訪讓齋藤教授精神奕奕，我跟他說了一點點散步的事，本來還想再多說一些，但是又不知道該怎麼敘述散步、我的孤絕，和我的雜亂無章這種種思緒。所以我轉了話題，跟他說我最近接觸到的病患。有一家人來找我諮商，他們是保守的基督徒，屬於聖靈降臨教派^②，他們是院內另一名小兒科醫師轉介過來的。這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而這個十三歲的男孩因為得

了白血病必須接受治療，但要承擔未來可能無法生育的風險。小兒科醫師建議他們可以冷凍儲存男孩的精液，等他將來長大結了婚，還可以用人工受孕的方式，讓他的妻子生下他的孩子。男孩的父母對於儲存精液的概念還算開放，也可以接受將來的人工受孕，但是卻因為信仰的關係，堅決反對讓他們的孩子自慰。這個難題目目前並沒有辦法用外科的方式解決，所以這家人簡直是陷入了天大的危機。他們前來找我諮詢了好幾次，私下也不斷為這件事情禱告，最後他們還是選擇要承擔可能不會有孫子的風險。只因為不能讓男孩犯下他們所謂的手淫之罪。

齋藤教授搖了搖頭，我知道他覺得這故事很有意思，也知道這種不合理而又悲苦的情節會讓他感覺有趣，同時卻又苦惱，就像我對這種故事的感覺一樣。「人都會做選擇，」他搖著頭說，「人啊，都會下決定，而且還要替別人做決定。那工作以外呢？你都讀些什麼？」我回答說：「大部分都是醫學期刊，然後還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書，只是我時常看到一半，就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讀完。常常才剛買完一本新書，很快就又不想讀了。」

「我也讀不多了，」他說，「現在視力沒那麼好；不過呢，我這裡可是已經塞得夠多了。」他比了比自己的頭：「其實都滿出來了。」教授的話一說完，我們都笑了。就在這個時候，瑪莉剛好端著柿子走出來；她手上是一只陶瓷碟子。我吃了半個，感覺有點太甜；我把剩下一半吃掉，然後跟教授道謝。

「戰爭的時候，」他說，「我背了很多詩，我猜現在的學校都不要孩子背詩了，我還在麥斯威爾的時候就發現這樣的改變。後來的這些世代，根本不會在上大學以前就背好詩、做好